

谷绍尤 独守传奇人生60年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 通讯员 张瑜



谷绍尤参军时的情形

核心提示

时光追溯到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22岁的谷绍尤作为摩托化方阵的一页,站在四个轮子都涂满白漆的卡车上参加了开国阅兵仪式,庄严地接受了共和国缔造者和30万首都群众的检阅,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时隔60年,当年英姿勃发的战斗英雄如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者。然而,对于这段珍贵的经历,谷绍尤至今仍记忆犹新。

兄弟4人当兵 3人负伤

1927年10月,谷绍尤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新区)的一个贫农家里。兄弟10人中他排行老7,还有2个姐姐早已出嫁。然而多子并没有给他的父母带来多福,因为生活所迫,他仅上了3个月私塾,家里就再也出不起钱供他读书了,他很小就给他家放牧牛、羊,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1946年7月,共产党领导的县武装大队驻进了村里。他们所带来的新鲜道理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他和他父母一商量,就报名参加了县大队。这一年,村里披红戴花、敲锣打鼓送走了7名棒小伙参加县大队。

在县大队,他刻苦学习文化,苦练杀敌本领,先后参加了大小20多次战斗。因为作战勇敢、军事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他先后当上了副班长、班长。同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到了年底,县里举办劳模表彰大会,为他

和县大队的其他两个同志一起披上大红花进行表彰。

说到这里,谷老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随即又变得沉重,他说:“我们村里一起出来的那6个人,有2个牺牲了,1个挂花了。”沉思了一下,他又接着说:“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我的二哥、四哥、六哥也参加了县大队。这个时候,县大队已经拥有4个连队,五六百人了。1948年秋,县大队编入人民解放军华北独立二旅,我当上了副排长,而我的三个哥哥先后因为身体和受伤原因离开了部队……”谷老停顿了一下,脸上透出一丝惋惜。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内心很紧张

1948年11月,保定战役结束后,谷绍尤和其他14个连排级干部调入华北步兵军政学校进行学习。这是一所培养连排级军官的军事学校,主要是提高作战部队的连排级军官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当时学校的学员分为北京两个大队、天津两个大队,新中国正在为接管北京和天津做着人才准备。

1949年8月底,已进入北京城7个多月,被编入北京卫戍部队的华北步兵军政学校政治队第六中队的谷绍尤,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命令。于是,他和所在部队的2000多名官兵开始了步兵方队的训练。

8月底9月初,北京的天气还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谷绍尤顶着炎炎烈日,踢坏了4双军鞋,苦练了整整30天英式队列直用长臂,却突然接到命令,方块队取消,改成摩托化步兵方队。

受阅部队不用练正步,改练站姿。他们全副武装,双手持枪,站在太阳底下好几个小时,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就这样练了半个多月,9月15日,在北京西郊接受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元帅的检阅。

“那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当讲到开国大典阅兵时,谷绍尤老人挺直了脊背。

“10月1日,天还没亮我和战友们就整装集合,经过严格检查,大家乘卡车从黄寺兵营前往天安门广场附近前门大街的一个集合点。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看到第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飘扬,我和战友们都激动不已,感觉热血沸腾。”

“开国大典的重头戏当然是阅兵了。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了各兵种部队。朱德总司令乘坐敞篷汽车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向全体指战员问好:‘祝同志们健康!’指战员们齐声响亮地

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总司令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体指战员呼应:‘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口号,不仅反映了统帅和士兵的互致问候,更反映了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良好祝愿。

“分列式开始了。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穿着水兵服的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方队首先通过天安门。紧接着,是步兵方队,两个月前他们还在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炮兵方队以野炮、榴弹炮,高射炮的阵容进入天安门广场。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编成的战车方队随后跟进……钢铁洪流气壮山河,势不可挡。”

“摩托化步兵方队的20辆军车并排成4行,每辆车上站立着25人,排成5排,双手紧握钢枪,随着汽车缓慢行进。当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随着一声命令,我和战友们的脸全部转向了天安门方向……”

“我当时在第二辆车上,站在第三排第二位,当时,我太紧张了,比打仗还紧张。也太激动了,精神过于集中,受阅车离天安门有近200米,我的眼睛一动也不敢动,结果,我只看到了天安门上的其他领袖们,而没有看到毛主席。”

据谷绍尤的老伴74岁的安桂兰介绍,她和谷绍尤是1955年10月8日在天津塘沽结婚的。婚后,他们谈起当年的开国阅兵,她才知道老谷还参加过开国阅兵呢!因为受检时精神高度集中,眼睛一眨也不能眨,他没有能望到毛主席。但她相信老谷见到毛主席了,因为对于每

一个受阅战士来说,毛主席都在他们心里。

参加阅兵 激励我一生奋进

开国大典不久,华北步兵军政学校完成了它的使命。1950年的正月初三,谷绍尤分配到了宁夏银川,在连队里当副指导员,一边生产一边戍边。1951年元月入朝作战,在志愿军某部后勤军械部当管理员。1952年的六七月份,在朝鲜战场五次战役结束后,他调到了志愿军某部炮团当连指导员。1953年10月回国。回国后编入65军195师在山西大同搞国防建设。一直到1964年,谷绍尤按少校军衔17级干部待遇转业到了郑州供电局。

“我当副职吧,我没有文化,是个外行,还是当个助手好。”当郑州供电局安排他当局组织部部长时,他诚恳地说。就这样他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还当上了局武装部部长,一直到1988年离休。

如今,谷绍尤在家养养花,种种草,锻炼身体,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谷绍尤说:“上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非常落后,那时真是穷得不能再穷了。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破衣服,那时兄弟姐妹多,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再给老三,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新衣。吃的是粗粮和野菜,吃了上顿没下顿,饱一顿饿一顿的。更别说吃肉了,吃肉就是梦想,就算是过年也只是一种奢望。住的

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子,上面是茅草,下面是泥地。时间久了,每逢雨季,那叫做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盆碗瓢瓢都派上用场,用来接漏下来的雨水。现在是幸运多了,穿的尽是漂亮的、名牌的衣服。吃的是既营养又好吃的面包,优质的珍珠米饭,香喷喷的鱼头,还经常上酒店。有些时候也只挑素食、野菜吃,因为吃腻了油腻,少了青菜都吃不下饭了。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补品,都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住的就更不用说了,单讲我家,屋内设施是一应俱全,冰箱、液晶彩电、洗衣机、液晶电视,现代化的家具,就连小区都弄得像大花园。不说风呀,雨呀,就连一般的地震也不用担心了等等,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祖国伟大成就的六十年,这就是由贫穷到小康再到富裕的六十年,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六十年。六十年的辉煌成就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要感谢党的正确方针政策。”

谷绍尤平常最喜欢的是看战争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每次看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剧,他都会想起自己的经历,想起开国大典参加阅兵的场景,想起和他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参加革命而牺牲了的烈士们。

他常常拿出在部队时获得的1枚解放勋章、6枚三等功奖章和1枚朝鲜政府赠志愿军的制军功章抚摸着,回想起那难忘的岁月和逝去的战友……

1952年的六七月份,在朝鲜战场五次战役结束后,他调到了志愿军某部炮团当连指导员。一天,他正和战士们一起加固山炮阵地,突然美军的侦察机飞过来了,他急忙招呼战士们钻进防空掩体。就在他刚跨入掩体一半时,一发炮弹落在了他原来的地方,一个志愿军战士牺牲了,还有一个耳朵震聋了……

“今年,我已离休的第22个年头,离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已有60年之久了。虽然当年那个英气十足的帅小伙子,已变成一头白发的老头子。可是,曾经的那个身着崭新军服、头戴钢盔的年轻的自己,还时常出现在梦里,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缘分以及它所带来的震撼与感慨,60年来我也从未忘却,激励我一生奋进……”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谷绍尤更加怀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新中国60周年大庆很快就要到了,如果有可能,我想带着老伴和孩子们一起去天安门前看一看,看看自己当年曾经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地方,也让自己感受一下60年来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记者,他透露了一个埋藏在心里很久的愿望。



谷绍尤跟老伴讲述当年参加开国大典时的盛况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news.com

二手烟无害论的公共博弈价值

9月21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举行,两个小时里,来自不同领域、对控烟持不同立场的市民代表畅所欲言,其中夹杂激烈交锋。参加听证会的烟草商代表辩称,二手烟基本无害,控烟立法要考虑众多烟民的习惯和有关权益,还要考虑烟草业目前对经济发展、就业的促进和重大贡献。(《东方早报》9月22日)

“吸烟有害健康”,吸二手烟同样有害健康,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公共场所禁烟,依据的都是这一常识。禁烟之所以是一个公共话题,就在于烟草危害已超越个人私权,吸烟不仅损害当事人健康,而且通过“二手烟”危害到更多人的健康。但现在居然有人挑战常识,称“二手烟基本无害”。

挑战常识往往付出代价,这次烟草商代表的言论便遭到很多网民谴责,有人称其“讲话水平太差”,还有人说“那技术真有没良心的”;也有人表示理解,因为他是烟草商代表。我在此想讨论的是,烟草商代表的言论价值何在?我们是否应该容忍这样的言论出现?

以笔者之见,不同的言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而立法听证会恰是利益博弈的场所,各方只要有自己的意见就应该鲜明地提出来,接受舆论的检验和公众的选择。一项公共政策或法律,本来就应该是在各种社会力量 and 团体的辩论、博弈与交锋中,在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兼顾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妥协和平衡,才最终付诸实施的。

类似的例子在去年“两会”上也曾经出现过,当时,女首富张茵炮轰《劳动合同法》,建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项条款,在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正如当时有评论所指出的,在一个民意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的时代,指望道德高尚者为利益已多元化的人群统一发言,无疑是政治民主神话般的想象——我们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或者指定代理人自己发声。因此,必须宽容那些挑战多数人常识的言论。

事实上,据200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两名美国科学家检查了加州一项长期研究,结果表明,吸入别人吐出的烟,对心脏病或肺癌风险均没有影响,这项研究结果使人对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措施生疑,并表明很多有关消除吸烟的耸人听闻的说法都是误导。当然,我们同样可以怀疑,这一研究是否与烟草商有瓜葛,其科学性也值得进一步讨论,但至少说明,“二手烟无害”论并非一点来由都没有。

退而求之,即便科学最终证明二手烟确实对人体非常有害,烟草商代表的言论只是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我们也无须视这种言论为洪水猛兽。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让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又看到真理在放手交战时会败下阵来?”在公共政策的博弈中,同样也需要真理与谬误的交锋,这既是民主决策的需要,也是科学决策的保证。 陈才

敢和总理争论 地图社了不起

今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35中学听课,其间指出该校使用的地理教材中的问题——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不清楚,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

9月21日下午2时许,中国地图出版社突然在其网站发布声明,称地理教材将陕甘划入华北未错,并给出了言简意赅的理由,即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包含陕西、甘肃、宁夏的一部分,与通常认为的原行政或经济概念中的“华北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则题为“关于最近媒体对我社地理教材有关报道的情况

说明”中,出版社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列举种种事实和依据,坚持认为教材中的划分没错。

太了不起了!由于地理知识的欠缺,我没办法论证此番争论的是非,当然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中国地图出版社所论证的一定就是对的,这是否最终结论尚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敢于和总理的观点争论,这不正说明我们的政治在走向现代吗?总理也是人,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术问题上,总理说的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科学结论一经总理辩证就不再成立。

中国地图出版社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在于敢于与总理“叫板”,不因为总理发了话,就从维护总理的威信计,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违心地发表一个认错声明,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正面表态:我们没有错!一味地信奉上级指示,只要是上级领导的话,哪怕错了也认为是对的,这叫什么?这叫唯上主义。这是一个精神的牢笼,需要勇敢地冲破。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想必总理看了这则声明也会感到高兴,因为出版社的态度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具有独立人格,能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现代公民越来越多。 以仁

公车轮休

去年10月,安徽省有关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今天是第三个“无车日”,但不少公务用车司机表示,从来没见过“公车轮休”这回事(9月22日《中安在线》) 公车轮休看尾号,政策去年已定好。不料又到无车日,司机居然称不晓。 纸上功夫做得巧,不如带头执行好。 公车如若不带头,宣传再多也无效。 刘道伟 漫画 李军 配诗



中石化总裁的怪论让人笑掉大牙

读到中石化总裁王天普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的一番高论,惊骇不已。针对中石化背负的“垄断”骂名,王总裁义正词严地声称:“中国石化不存在‘高额垄断利润’问题。此前在国内油价倒挂的情况下,‘中国石化’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在国际市场价格远高于国内的情况下,先后组织大量进口,为此承担了巨额的价差损失。如果说这也是垄断,试问有谁愿意这样赔着钱去垄断?”(人民网9月22日)

问问全天下的人,中石化是不是垄断企业,我想,除了王总裁,没几个

人会否认吧?王总的理由有二:一是国内石油石化行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竞争的格局;二是列举上述承担巨额价差的损失一例,证明哪有巨额垄断的理。

先说第一点。诚然,国内石油石化行业看似形成了一个竞争的格局,形成了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鼎立的局面,但中海油占有的市场份额很少,基本构不成对前两家的竞争态势。至于一些民营石油企业,那更是不值一提,现状仍然是中石化、中石油两家独占国内的石油市场。要说竞争,也是两家垄断寡头之间的竞争。

再说第二点。我怎么也搞不懂王总所说的巨额的价差损失与否认垄断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的情况下,先后组织大量进口”,有这回事,但这是经营行为,无关企业性质。况且,我不认为中石化当初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自愿作出牺牲,不然,它也不会理直气壮跟国家要“红包”。

王总的辩解不但难以洗脱“垄断”的骂名,相反只会招来更多的讥讽和谴责:既然连垄断都不承认,那就别指望他们能铲除垄断积弊,让利予民了。 徐进

廉价农民工是否成过去

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从南方制造业企业过来招工的人事经理们枯守多日收获无多。报名者本来就少,参加面试更是寥寥。企业开出的1500元月工资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一个砌墙的技工称他们的月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金融危机期间不把农民工当包袱甩,或者以前务工时的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权益都有保障,“我想大多数不会这样”。(央视网9月22日)

企业难以招到足够农民工被认为是“民工荒”,另外一个务工输出大省河南此前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形。大批“悲催”的农民工让珠三角不少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头疼不已,以往几年来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良好感觉已经不再有了。一方面是企业开工不足,急需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再三挑剔,工资也呈上涨趋势。这样有利于农民工的“乐观”情形,是不是意味着持续多年的“廉价农民工”已成明日黄花?

我却远没有这么乐观。对于农民工,经济逐渐回暖、企业纷纷开工,工资水平上涨,固然是一个坏的消息,可这种“利好”仍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南方大批制造业企业能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将农民工视为累赘而纷纷抛出,当然也就能在经济回暖时降尊纡贵地请他们出来做工。用工一方的地方政府和资方态度变化的依据,只是自家的利益、地方的发展。外部环境好,就让农民工留下打工;经济环境一旦恶化,则立马请农民工开工。至于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改善一下农民工的群体权益及自身发展,则很难讲。

这一轮经济回暖,南方制造业企业大举招工,除了开出的工资稍高了一些外,农民工之缺乏保障、缺乏权益的情形与前几年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即使是在看似上涨了的那点工资,也很难改变常年漂泊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处境。

再者,农民工不再廉价仍不过是局部现象和短期现象。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提高仍嫌缓慢,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7000万农民工中,中高级工占35%,高级工只有0.5%。如果把农民工算进去,那中高级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过20%。大部分农民工基本上无任何职业教育培训,都是边干边学。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处于漂泊中,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缺乏职业教育的他们当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而呈现出疲态。

评论者每每倡言农民工“市民化”以融入城市,而农村的家国依然是农民工们在城市呆不下去时的最终依靠。即便勉强留在城里,由于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报酬低,且普遍缺乏劳动保障,也很难避免其成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所以,不能仅仅看到农民工月收入达到5000元就大惊小怪,应看到这个群体依然严峻的生存问题,更应看到现存的城市差距。社会学家陆学艺说过,改善待遇只是治标,根本上要从社会体制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民工荒”频发,正是改变这一问题的契机。 书印